

三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情况

供内部参考，如需
引用，务请迳从原文

目 录

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蒙古〕A·劳布桑登德布	(1)
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6)
*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苏联〕M·И·戈尔曼	(10)
蒙古人民共和国语文研究发展情况	〔蒙古〕Ц·达木丁苏荣	(19)
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和目标	〔蒙古〕贊巴扎布	(22)
国际蒙古学家会议——第三次大会	〔日〕服部四郎	(24)
国际蒙古学(第三次)大会	〔日〕小泽重男	(25)

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蒙古〕 А·勞布桑登德布

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至八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

这次会议除法国、瑞典、土耳其、西德没有参加外，苏联、中国、蒙古、朝鲜、捷克、波兰、东德、罗马尼亚、芬兰、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匈牙利等十五个国家的四十多名学者前来参加。蒙古近百名语文工作者也列席了会议。从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国家来看，蒙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广泛注意的一门学科。

谈到第一届蒙古学学者会议时，首先必须肯定苏联学者们对蒙古学作出的贡献。苏联著名学者瓦·施密特、А·保布罗尼克夫、О·卡瓦列夫斯基、К·戈拉斯顿斯基，尤其是蒙古学家В·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学形成自己的科学体系，并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学科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与此同时不能不提到芬兰学者拉木什替德、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著名学者策旺等的名字。因此，在会议大厅里悬挂了上述学者和蒙古学最初奠基人八思巴、恭吉敖斯尔、阿尤希吉希、扎雅班弟达、那木海扎木苏等人的画像。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发表了三十四篇学术论文。各代表包括列席会议者对每篇论文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这些学术论文不仅集中在蒙古学学科领域，而且从整个阿尔泰语系学方面来说也是出色的。

科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Д·策波格米德在开幕词中阐述了蒙古学历史来源、世界各国蒙古学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对蒙古学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翁独健在题为《十年来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中，阐明了在中国研究蒙古学的活动，蒙文文献资料的出版和蒙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语言学方面，谈到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内蒙地区组织两次语言调查队，搜集大量资料进行整理的情况。报告说目前已搜集古典文献近三千本，民间文学资料上万种，其中已出版了《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格斯尔传》、《江格尔传》等叙事诗以及诗歌、谚语等。在文学方面，正在着手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研究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吉拉兰萨、丹森旺吉勒、贺希格巴图、嘎玛拉等人的生活和创作。

朝鲜蒙古学家洪吉梦在题为《朝鲜语和蒙语的关系》的论文中，谈到朝鲜研究蒙语的悠久历史，从十三世纪开始研究蒙语，到一三九三年朝鲜建立了са ёк вон的组织，最初研究蒙语和汉语，后来也研究日语和满语。到一七六八年蒙古学家лик ох сон·编纂一部《蒙朝

辞典》，一七九〇年蒙古学家ПОНХЕЕН除修补了蒙朝辞典外，还编写了《蒙语课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而中断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学研究工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新恢复了蒙古学研究，并日益得到发展。

日本学者坂本，在题为《日本的蒙古学研究》的报告中，谈到蒙古学研究在日本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日本当前蒙古学研究情况和蒙古语新词术语对日本的影响问题。

印度学者拉胡勒在《向世界介绍蒙古的优秀作品》的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对蒙古学研究的情况及出版蒙文文献资料的庞大计划。

有关蒙古文字史方面，印度学者帕格瓦作了引人注目的《用藏文编写的蒙文书籍》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对照蒙藏两种文字后从中找出的规律性的共同性，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用藏文拼写蒙语的规则。

蒙古族的文字历史曾有十几次采用新文字或者进行文字的改革：如先后试用过维吾尔蒙文、托忒文、藏文字母、索永布文字等等。对于这些文字由于学者们的努力，人们或多或少还能认识一些，但在蒙古地区曾广泛使用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还都懂得的藏文，至今还未被人们所重视。因此辨明藏文拼写蒙语的规则和特点，以及对研究蒙古文字史方面，帕格瓦的报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蒙古语语法方面，苏联学者Г·Д·桑杰耶夫和日本学者阿部·大泽作了十分有趣的报告。

Г·Д·桑杰耶夫在题为《蒙语动词的结构》的报告中，从各个角度分析蒙语动词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新的见解，尤其是对蒙语动词态的范畴、构成动词的语法形式、构词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划分意见。

一般来讲，语言的结构问题在现代语言学上是一门十分重要，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某一具体语言的结构范畴。所以桑杰耶夫不仅对蒙语的研究而且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意见。

阿部教授在题为《关于蒙语动词的过去时》的报告中，关于现代蒙语动词过去时的附加成份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学者大泽在题为《中世纪蒙语动词阴性附加成份问题》的报告中，谈到古代蒙语语法明确区分词性和阴性动词诸附加成份的问题。关于古蒙语词性问题大泽的意见具有特殊意义。

蒙语词汇研究方面，И·达木丁苏荣的《芷语中的蒙语借词》，苏联著名蒙学学家Ю·罗利赫的《蒙语中的芷语借词》和芬兰学者平提·阿尔托的《卫拉特妇女的语言》等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罗利赫说，以前符拉基米尔佐夫、拉帕拉格、施密特、桑杰耶夫等人，研究过土耳其语中的蒙语借词和蒙语中的汉语借词问题，那么现在研究蒙芷两语相互借词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从古到今，蒙语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出现借词的例子是很多的。同样也存在蒙语口头语和书面语被芷语和芷文所借用的现象，在芷语的行政术语、官职名称中也有不少的蒙语借词。十七世纪，由于部分蒙族到西芷地区的影响，使芷语用了一些蒙语中的游牧经济术语；十八至十九世纪随着在西芷寺庙中蒙族喇嘛人数的逐步增多，对芷语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芷语借用蒙语词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蒙古教授И·达木丁苏荣在报告中简明地论述了芷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以及蒙语中借用芷语词的大量事例。这个报告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科学工作者旺岱在题为《现代蒙语名词术语》的报告中，论述了多年以来通过把蒙语书面语和口头语中的名词术语同欧洲和俄国的名词术语相互对照、翻译、创造的途径来制定新词术语的规范原则。

芬兰学者平提·阿尔托在题为《卫拉特妇女的语言》的报告中，谈到卫拉特妇女有她们自己的独特语言及其三种情况：一是迁到有必要忌讳的语词时采用近义词；二是如找不出近义词时改变该词的语音，即把第一音节的语音用舌面中擦辅音^н来代替；三是用隐语。卫拉特人称它们是бэрлэ、бэрмсх、цээрлэ。

丹麦学者K·У·柯勒哈拉米在题为《蒙语中区分牲畜口齿的两种办法》的报告中概述了区分牲畜口齿的“西都楞”（三岁），“苏岳郎”（四岁）和用数词“关今”（三岁）“敦今”（四岁）等基本用法。

民主德国蒙古学家П·А·拉兹聂夫斯基在《关于编写〈白史〉的年代》的报告中，出色的利用蒙语词汇材料，对蒙古历史文献《白史》的编写年代提出新的见解。

关于方言研究方面，苏联著名的学者И·策登丹巴耶夫在题为《关于研究布利亚特方言的总结和今后的打算》的报告中，阐述了研究布利亚特方言的历史，还提出近年来组织方言调查队，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把布利亚特方言分为东、中、南、中间等四种方言，并论证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在论文的末尾，他在强调继续研究布利亚特方言的同时，指出研究布利亚特方言对进一步研究蒙古语言历史大有好处。因此，他建议苏联的蒙古学家、蒙古和中国的语言学家共同合作组织方言调查队来编写专著。这个建议得到了蒙古国立大学老教授确吉拉苏荣等人的支持。他说：现在国内方言研究人员基本上是不熟练的年青人，因而在研究方言方面取得良好成绩的布利亚特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对我们研究方言肯定会有助益。

现在，方言区别处于消失阶段，如不及早抓紧调查研究，后人很难了解有哪些方言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因而只好猜测罢了。

付博士米希格搜集了哈姆尼干住地、氏族名称和现代哈姆尼干语的新资料，作了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些地区哈姆尼干方言的调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是研究方言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整个阿尔泰语系学方面的重要资料。

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付教授作了《关于巴林方言的语音学和词学》的报告。报告中详细叙述了研究巴林方言的成果和巴林方言的特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教授罗布桑旺丹在他的《蒙语方言问题》的报告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搜集整理的方言调查材料提出了划分方言的意见。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相互关系问题方面，波兰蒙古学家С·卡鲁林斯基在《关于蒙古语和雅库特语的关系》的报告中，阐明了雅库特语是蒙语影响最深的土耳其语之一，在雅库特语词汇中蒙语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卡鲁林斯基对雅库特语中的蒙古借词作了对照以后，得出在十四至十五世纪，蒙语对雅库特语影响最深的结论。

朝鲜学者洪吉梦在《朝鲜语和蒙语的关系》的报告中，叙述了朝鲜语和蒙语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和互相借用名词术语的问题。他例举很多朝鲜语中借用的蒙语牲畜名称、颜色的词以及行政术语。尤其报告中谈到朝鲜在一四四三年出版的《тэн мы》一书中分为元音、辅

音一事，这进一步说明了蒙语对朝语的影响程度。

美国学者乌特普什在《关于阿尔泰语的词干问题》的报告中说，词干是检验诸种语言是否属一个语系的唯一依据。毫无疑问，如果印度和欧洲语中有二百多个同类词干的话，那么阿尔泰语系中有同类词干近一千个，便足以说明这些语言是属于一个语系。

捷克学者П.Х.胞哈在《阿富汗蒙古人的语言和普通语言学》的报告中，谈到塔吉克·卡卜利·阿富汗·仆什托等伊朗语对蒙语的影响问题。

苏联学者Э.А.德瓦日彦克夫关于蒙语对伊朗语的影响问题，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他说，任何语言的外来语在该语言词汇中曾一度是带有个性的附加层，但阿富汗语中的蒙语借词却不是这样。例如：有“人民”意思的词，在阿富汗语中有十来个，象“国”这个蒙语词在阿富汗语中成为“人民，人民大众”的意思，所以称“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时就成为“人民”了。

蒙古科学工作者班扎拉克齐在《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蒙文翻译问题》的报告中，阐述了蒙古翻译工作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大革命时期翻译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成就。

在文学研究方面，蒙古学家Д.达木丁苏荣作了《关于蒙古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目前在蒙古语文研究事业中，有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是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大量搜集、出版蒙古族文献资料和文艺作品，其次，必须把蒙古族当中盛行的蒙古作家用英文或其他文字创作的《故事之海》、《苏布喜地》，还有表现蒙古族社会风俗的翻译作品《喜地呼尔》等纳入蒙古族文学史中。

中国学者额尔敦陶克陶在《关于尹湛纳希及其作品》的报告中说，评论一个作者或他的作品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的态度，而要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一层楼》进行分析。他认为尹湛纳希的作品对蒙古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第一，尹湛纳希第一个坚持了离开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依据，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蒙古族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层楼》；

第二，尹湛纳希使蒙古族人民更进一步地接触到了汉族文化；

第三，当时，尹湛纳希是一个善良而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史学家，给蒙古族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第四，尹湛纳希认真地研究了蒙古族的文学语言，在他的作品中较好地融合了南北地区的方言。

蒙古科学工作者Б.索德纳木在《几·纳楚克道尔吉的文艺作品》的报告中，论述了纳楚克道尔吉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诗歌、散文，以及他对蒙古族文学研究工作的重大贡献。

在民间文学方面，在大会上宣读了蒙古Б.仁钦教授的《关于本本故事》，仁钦桑布的《蒙古民歌的种类》，Э.奥云的《关于蒙古族对唱歌曲》，捷克蒙古学家П.Х.胞哈的《喀尔玛克民间史诗江格尔》等报告。

关于蒙古学研究的文献资料方面，蒙古国立大学老教员嘎巴杰·道尔吉作了题为《关于蒙文词书和名词选》的报告，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嘎巴杰·关布扎布作了题为《蒙古人用英文写的一些著作》的报告。该报告介绍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用范文编写蒙古族哲学、声学、逻

辑学、医学、工艺学等五个方面208人的简历。这一介绍虽不全面，但是足以说明蒙古族学者用范文编写的作品不仅是蒙古族的文化遗产，而且是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一部好工具书。

到会学者一致认为，内容极为广泛的第一届蒙古学学者大会，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历史新纪元，促进了蒙古学的发展。

（原载蒙古《科学技术》杂志1959年5—6期 吉木斯译，布林校）

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科研工作的友谊

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于1970年9月2日到7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过去出席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一次大会的四十多名科学家中，只有二十三位外国蒙古学家，但出席这次大会的三百多名与会者中，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140多名科学家。从出席的人数和所讨论的报告种类来看，这次大会比在十一年前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有质量上的差别。这充分证明了蒙古学研究工作在世界上有所扩大和进展。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次大会表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的提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国科学院外国院士、东方学家、著名的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珠科夫率领的苏联蒙古学家代表团，我国科学院外国院士、著名的蒙古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勒·里格蒂率领的匈牙利蒙古学家代表团，迪诺浩夫斯基教授率领的波兰蒙古学家代表团以及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我国科学院外国院士奥·拉铁摩尔和世界阿尔泰学协会总书记德·斯诺尔等组成的美国蒙古学家代表团，由著名的蒙古学家服部四郎率领的日本蒙古学家代表团，由著名的蒙古学家海西格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蒙古学家代表团以及法国、芬兰、英国、加拿大、挪威、瑞典、荷兰、奥地利、丹麦、土耳其、阿联、阿富汗等国家代表团。在蒙古学第二次大会上，各国蒙古学家不仅作了关于研究蒙古语言、文学的报告，而且也作了有关古今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经济、民族志学、考古学等学术报告，世界各国蒙古学究研工作情况以及各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等报告。

例如：蒙古科学院通讯院士普·浩尔勒付博士作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语言学研究》，苏联语言学家桑杰耶夫教授作了《蒙语的第一音节〈Д〉〈Т〉及其同土耳其文的关系》，日本服部四郎教授作了《关于蒙古秘史中的〈人〉字》的研究报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学家巴乌维（女）报告了《蒙古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蒙古文学里的反映》，印度拉呼勒教授报告了《在印度的蒙古学研究工作》，芬兰的平提·阿尔托教授报告了《蒙古语的付动词》，匈牙利语言学付博士勒·勒仁基报告了《关于蒙古神话》，苏联德立科夫教授报告了《苏蒙关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尔提维克教授报告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蒙古历史学付博士巴达姆哈丹报告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等，共一百〇六项报告。大会上的每一个报告都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因为他们对蒙古学研究作了各种新的尝试。

从出席人数和在大会上作的报告种类乃至从科研工作的广大意义上来看，这次大会是科

学、文化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情。

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是在各国科学家共同合作及科学家为和平友谊服务的气氛中举行的。

（原载《蒙古消息报》〔汉文版〕1970年9月12日，编者略有删改）

各 国 蒙 古 学 家 谈 感 想

蒙古《文艺报》特派记者米·策登道尔吉，采访出席国际蒙古学学者大会的七位蒙古学家，提出了如下四个问题：

一，您对蒙古学的意义看法如何？

二，您对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有何感想？

三，您对蒙古学研究今后计划如何？

四，您认为目前研究蒙古现代文学的情况如何和今后应该作些什么？

勒·里格蒂（匈牙利科学院付院长、院士、教授）：

一，毫无疑问蒙古人民的语言、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人类整个文化、加深各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有机会出席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我认为这次大会，除表明国际蒙古学工作取得的新成就以外，还更全面地表达了蒙古科学发展的成果。

三，我从事研究蒙古语言文学以来已经五十年了，今后仍继续研究上述学科。

四，尤其是详细研究蒙古现代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我认为应该爱护与发展文学的主要武器——蒙文。

小泽重男（日本东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

一，我认为在政治、经济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可是，蒙古学这门科学工作能够把这么多国家的科学家聚集一堂举行大会，这对蒙古学有重大意义。

二，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再次在乌兰巴托举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件。我谨祝大会为继续发展蒙古学的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三，我是研究蒙古语言文学的，今后也仍做这个工作。

四，我认为有必要把现代蒙古文学用各种语言翻译出版，我正在用日文翻译罗岱丹巴的长篇小说《清清的塔米尔河》。

奥·拉铁摩尔（美国教授）：

一，明年将纪念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周年来临之前在蒙古集聚这么多国家的科学家举行大会，是难以想象的，过去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今年举行的这个大会说明蒙古已成为研究现代蒙古学的中心。

二，这次大会一定会圆满结束。

三，我已进行了蒙古历史、蒙古民族志学、地理以及蒙古和中国之间的长城历史等研究。而且我在英国连续七年当了蒙文教师，今年已经退休了。但我准备进行现代蒙古学的研究工作。

四，我对文学是外行，不过对蒙古的民间文学还有很大兴趣。

阿·奥克拉德尼科夫（苏联科学院院士、教授）：

一，蒙古学从历史角度来说，对人类学有重要意义，尤其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和世界命运同蒙古古代史具有紧密的联系。现代蒙古人民的历史性经验，中亚细亚游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跟历史学家有特殊的关系，这比研究十三和十四世纪世界征服者的历史还要重要，这个历史给其他国家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二，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证明了是蒙古学研究工作上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或者说巨大发展。

三，我是研究蒙古古代史的，中亚和蒙古同人类原始社会史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气候条件如何影响这个地区的开化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使我更感有兴趣。在蒙古发现了许多有关人类文化最初的宝贵文物，我将在蒙古的戈壁阿尔泰和东部地区继续进行考察，这是我今后要作的主要工作。

四，应该用外文出版更多的蒙古现代文学作品，我也很赞同在我们苏联出版许多蒙古作品的译文。

巴乌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古穆博里达大学亚洲教研组的工作者）：

一，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从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国家，并且以自己的具体经验为新独立的年青国家树立了走向幸福与未来光明道路的榜样。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道路，不但极大的引起世界科学家的兴趣，而且全世界所有的进步人民以羡慕的心情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农牧业、文化和教育等各部门的发展，因此各国蒙古学家已面临重要的任务。最近几年里我国蒙古学研究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培养第三代的蒙古学学者。

二，我出席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很感高兴。这次大会给我们创造了同各国蒙古学家相识和交流经验的良好机会。我衷心感谢蒙古朋友组织的大会圆满周到，并祝愿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我是研究蒙古文学和社会学的。我打算考取学位后从事培养蒙古语文的人材。

四，我认为研究与翻译蒙古现代文学很重要，因为我国人民越来越对反映蒙古工人阶级、牧民、农牧业合作社以及新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感兴趣。我们准备在蒙古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前翻译出版蒙古文学作品选。

维·海西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授）：

一，蒙古学发展很快，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蒙古学，蒙古本身的文学研究工作也很有进展。策·达木丁苏荣、达·策仁索德纳木、普·浩尔勒等许多人在文学研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所劳动的成果。

二，我非常高兴地出席这次大会。我是这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我认识许多蒙古学家。这次大会，是蒙古学界的一件重大事情。研究蒙古的各国科学家共同合作和互相熟悉，这样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我是研究蒙古文学史和蒙古历史的。我作了原版在北京收藏的木版书的统计，并写了一本取名为《关于蒙古历史》的书。同时，还出版了西欧各国收藏蒙古书的统计书。另外我已经写完至十九世纪的蒙古文学史。

四，应该大量的研究蒙古古代文学，古代文学著作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用各种外语翻译出版这些作品是一件有益的事。

应该把蒙古叙事诗和其他作品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便丰富世界文学宝库。

敖恩·额尔根格（英国利兹大学教师）：

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别人知道自己，同时还应该知道别人

二，国际蒙古学第二次大会的召开是件好事，可是这次大会经过十一年才举行，我的意见是在每五年内举行一次是适宜的，因为蒙古国家正在日益繁荣和全面发展。

三，我在英国利兹大学初次开办的蒙语系担任蒙文教师，目前正在用英文翻译二十世纪的蒙古英雄人物传略。提到二十世纪的英雄人物，首先于1955年我和拉铁摩尔一起翻译了苏和巴特尔的传略，其中包括牧民阿尤希、玛格沙尔扎布、达木丁苏荣、陶格陶胡台吉等人的传略，还有泽登巴尔编写的《乔巴山的生平事迹》一书。我还正在翻译沙·纳楚格道尔吉的著作《陶王和他的学说》一书，又同两名学生合译了作家达·纳楚格道尔吉的歌剧《三座山》。此外又编写了教课书和蒙英小字典。1971年已出版《自传》一书。

四，对文学不太内行，我主要研究的是历史。可是不能不读和研究像达·纳楚格道尔吉那样人的作品。

（原载《蒙古消息报》〔汉文版〕1970年9月19日 编者略有删改）

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闭幕

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大会1970年9月7日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闭幕。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勒哈姆苏伦，部长会议付主席彭斯格诺尔布等出席了大会闭幕式。

蒙古科学院院士那楚格道尔吉、科学院通讯院士普·浩尔勒就各小组工作作了报告。

历史经济小组会议继续了四天，共作五十四篇报告，语言文学小组会议讨论了五十二篇报告。这些报告对发展蒙古学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闭幕式上苏联、日本、越南、美国、古巴、阿富汗、芬兰等国的蒙古学家发了言。他们分别指出：国际蒙古学学者第二次会议是科学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动人大事，并高度评价了各国蒙古学家的科研工作。同时特别指出，这同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和蒙古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密切的联系，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有力证明。

会议还成立了国际蒙古学学者大会常设委员会，并通过了该委员会章程草案。蒙古科学院院长Б·锡林迪布院士当选为常设委员会委员长，Л·里格蒂（匈）、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苏联）、服部四郎（日本）、拉铁摩尔（美国）、德立科夫（苏联）、古贝尔（民主德国）、布尔哈德（美）等被选为付委员长，罗布桑旺丹被选为秘书长。

锡林迪布院士在会上致了闭幕词。当天国际蒙古学学者大会常设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委员会的今后工作。

（原载《蒙古消息报》〔汉文版〕1970年9月12日 编者略有删改）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苏联〕M·N·戈尔曼

一九五九年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家——语文学者会议，为世界各国蒙古学学者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基础。一九七〇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是发展这一合作的重要标志。第二届会议决定定期（五年一次）召开国际蒙古学学者科学代表大会，选出以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B·锡林迪布院士为首的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ИКМКМ）——这一取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科学组织法律地位的使各国蒙古学研究工作互相协调配合的执行机构。

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召开后的五年中，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在保持和扩大从事蒙古学研究工作的四十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互相接触、交流情报以及相互合作方面，在加强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方面，在使各蒙古学研究工作协调配合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一起发起和组织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于一九七三年在乌兰巴托召开的《游牧民族在中央亚西亚文化和文明中的作用》国际代表科学讨论会，积极参加了一九七五年在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召开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了国际阿尔泰学者常务会议的各届年会，参加了国际东方学者和历史学家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从而使世界蒙古学获得了显著进展。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出版了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汇刊两卷，《蒙古学研究》丛书四卷，蒙古社会学者近十五年来著作的简介性书目四卷，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集体和个人著作二十余部。

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常支持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积极参加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保证了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的按时召开和顺利进行。这次会议是各类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代表性最强和规模最大的聚会。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三日，在乌兰巴托蒙古工会中央文化宫举行。在隆重的开幕式上，会议组织委员会主任、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常委会主席B·锡林迪布致了简短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对来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波兰、古巴、越南、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代表团，对来自印度、加拿大、美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瑞典和日本的代表团，和沿着科学旅行路线前来参加大会的十个国家的四十多位科学家，表示欢迎。

参加会议的约二百名代表和来宾，代表了欧、亚、美将近三十个国家所有主要的蒙古学中心，这种中心的数目近五年来已有显著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梵文学协会第一次派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国际阿尔泰学学者常设组织（ПИАК）的代表X·贡布扎布教授（美国）也参加了会议。

由六名科学院院士、四名通讯院士、十三名博士和十七名付博士组成的蒙古代表团，是这届大会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代表团。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报刊、电台、电视和外交使团的代表出席了这届会议。

会上宣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蒙古人民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名誉院士尤·泽登巴尔的贺信。贺信说：“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者会议是在世界形势更加缓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和互相合作走向正常化并得到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人民政权年代蒙古人民生活中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蒙古学的发展。在蒙古国内，对蒙古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所进行的研究，在全国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①

Б·锡林迪布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苏联）、黄维南（越南）、O·拉铁摩尔（美国）当选为副主席。苏联、法国、美国、匈牙利、大不列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当选为秘书处成员。语言学博士C·罗布桑旺丹（蒙古）被任命为大会总秘书。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Б·锡林迪布作了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与科学互相作用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贯穿了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科学与社会发展需要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锡林迪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不但为蒙古人民在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开辟了道路，而且还使国家取得了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他清晰地描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学科中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介绍了蒙古科学的进展、学术机关组织机构的改善、科研干部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加强等方面的总情况。他特别指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共有科学院所属的十四个科学研究所和二十七个各部的科学研究所以及大学、设计机构和试验室在从事研究活动。②Б·锡林迪布强调指出，在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讲，就为发展科学、变科学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蒙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力量，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会议活动分三组进行：第一组为“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组，第二组为“蒙古语文学和艺术学”组，第三组为“蒙古与中央亚西亚地区”组。整个会议期间共听取和讨论了一百三十九篇报告，其中大部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家——会议的组织者提出的。

在第一组活动中，首先由该组召集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III·纳楚格道尔吉院士作了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报告。报告叙述了1970年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包括从古至今全国历史各个主要时期在内的历史研究概况；指出了在研究包括蒙古封建社会历史问题在内的—系列根本问题方面，在写出综合性的集体著作和专题著作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强调了现代史方面的最新著作，其中有Б·锡林迪布的专题著作《蒙古人民革命史》，有蒙古作者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农业和文化建设史的集体著作以及蒙古作者同苏联学者合作的诸如《苏蒙关系史》这样的有关迫切问题的著作等等。报告人陈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代历史学者对蒙古革命经验的一些特点的看法，在

蒙古历史学者看来，这些特点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共同规律性方面有其意义。对此进行研究将是历史科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些特点是：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广泛地让人民群众参加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坚决彻底地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取得经济上的完全自主；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交通、国有制和合作制的经济成份；限制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建立工人阶级和人民知识分子队伍；实现文化革命；建立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等等。

蒙古的学者在本组所作的报告中，有哲学博士С·敖日布桑布论哲学思想的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П·罗布桑道尔吉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学研究，历史学博士А·米尼斯论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史研究，历史学付博士А·玛木和Б·苏米亚论蒙古革命的国内史料问题。还有历史学付博士М·И·戈尔曼（苏联）在本组所作的论当代蒙古学者关于蒙古近代史著作的报告，介绍了最近五年来社会主义蒙古在社会科学包括蒙古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扩大了研究范围和题目；提高了理论和科学水平；增设了相应的科学中心；配备了具有高水平的干部等等。举例来说，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东方学等研究所共发表集体著作和专题学术著作三十多部；发表分属于八套丛书的文献资料十种；在同一时间，获得付博士特别是博士学位的专家人数大大增加。这些事实就是上述成就的证明。^③

正如许多报告人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社会科学的显著进步，首先反映在对下述问题所作的探讨上：如一九二一年革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历史和历史编纂学，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诞生和巩固及其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历史，党的建设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经济部门的结构和经济的强化问题，在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确立问题。同时，还反映在对下述问题所做的研究上：如蒙古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蒙古在满清政府统治时期和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封建神权君主制时期的对外关系。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加强的领导作用，科技革命（ITP）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共和国经济，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中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一代新人的培养。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目前正在解决的，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基本方面，同提高生产力、改善社会关系、用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劳动人民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组的多数报告（十七篇）谈的是有关蒙古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重要问题，有十三篇报告谈到了考古学、民族志学和历史编纂学问题。这些报告的选题和内容反映出会议参加者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学术兴趣和专业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形成的各国蒙古学流派发展的特点和轮廓。

蒙古的许多学者在多年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以综合的方法和认真的态度研究蒙古人民的历史和现状、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蒙古社会的阶级结构等等，努力进行广泛的归纳和总结，这些都在他们的报告中得到了体现。历史学博士П·贡戈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传统的畜牧业问题作了别具一格的新解释，他认为蒙古畜牧业是一个建立在严格遵循季节周期进行作业、周密分配经济功能基础上的复杂经济机体。历史学博士М·桑

道尔吉在报告中指出了蒙苏人民友谊在蒙古取得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中所起的基本作用。历史学博士Б·图德布的报告，分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转变为社会领导力量的过程，分析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及与合作化牧民联盟中实现主导作用的手段。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Х·坡日列首次提出了蒙古人民在牲畜身上加盖印记的性质直接取决于部落的种族组成和文化水平的看法。历史学付博士Г·苏赫巴特尔阐述了匈奴是原蒙古部落的问题，他详细论述了匈奴是蒙古人的祖先这一观点。历史学付博士Ч·达赖提出了中国元朝的灭亡导致了在蒙古境内建立一个北元国（1387~1403年）的假设。

苏联代表（历史学付博士С·Д·迪雷可夫、Д·Д·罗布桑诺夫、历史学付博士Ш·齐木德道尔吉耶夫、В·В·戈莱沃伦斯基、Г·И·斯列萨尔丘克、Г·С·郭罗霍娃等人）的报告带有类似性质。如国民党制度下内蒙古的处境，苏蒙文化交流的扩大，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例的游牧民族实行定居等迫切问题，都在他们的报告中得到阐明。

С·Д·迪雷可夫的报告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当地居民中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和汉化政策的有害性实质，并且十分有论据地论证了毛派民族政策的许多方面与国民党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有着相似之处。

В·В·戈莱沃伦斯基在报告中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游牧民族范畴的居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问题。这一报告的基本观点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兴趣。他强调指出，这些居民现在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今后一定时间内完全过渡到定居，这是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和集约化直接相关的。Г·И·斯列萨尔丘克根据俄国档案材料，对奎什台吉和顾实汗（图鲁拜胡）就是同一个人提出了有力的论据。Г·С·郭罗霍娃就俄国和卫拉特的有关问题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报告。集中力量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以后发展的经验，包括共和国文化建设的经验，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关系，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学研究的特点。④Х·皮阿茨博士关于二十至三十年代蒙古情况的德文资料的报告、У·绍涅关于蒙古文化革命的规律性和特点的报告，就是上述问题的证明。Х·皮阿茨指出，只有魏玛共和国时代民主的革命的报刊和政论文章，首先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出版物，才客观报导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变革情况。У·绍涅的报告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文化变革与社会经济改革的有机联系。Г·亨拜尔在报告中介绍了И·舒伯特教授在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学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波兰著名学者B·迪诺夫斯基教授和Д·马尔科夫斯基教授关于蒙古游牧业现代文化的报告，С·申凯维奇博士关于蒙古亲属关系系统进程的报告，都证明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历史文化研究和社会主义蒙古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成就。这几位报告人根据多次田野考查搜集到的丰富资料，向听众介绍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最终形成的牧民传统文化和现代合作牧民文化的形成要素及基本特点，介绍了人民政权年代亲属关系的社会意义标准的变异问题，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此外，波兰代表团团长Х·霍莱院上和Д·巴齐列夫教授在发言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主张和平共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这反映出波兰蒙古学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对研究对象的透彻了解，对具体考古材料和语言材料的仔细分析，亦即西方蒙古学者的优秀代表人物所具备的那些特点，在B·桑梅斯特罗姆教授（瑞典）对很少有人知道的以哈

喇浩特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材料进行的情审概述中，在N·波布兰教授（美国）对重要的社会学术“济农”（“ДЖИНОН”），所作的独特的解释中，吉维罗尼基·魏特博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十八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报告中，都得到了反映。

欧美蒙古学者前辈O·拉铁摩尔（美国）所作的报告《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E·桑布的生平事迹》，立足于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充满了对被研究人物的同情和敬重之感；卡伦·罗林教授（加拿大）所做的报告《现代阿富汗的蒙古人》在许多方面都根据了学者本人进行的有趣观察。他们的报告反映出西方蒙古学研究工作出现了现实化的过程。

日本蒙古学女学者矶野富士子近年来同著名学者如坂本是忠、田中克彦等一起从事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⁵在会上，她作了题为《翁格伦·冯·施特伦贝格与日本人》的报告，企图（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资料）把“疯狂的男爵”的日本庇护者及走卒说成是一批微不足道的冒险家、“骗子手”，把他们的活动说成是自担风险，似乎与官方政府毫无关系。这就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辩护，因而很难令人信服。矶野报告的主题是当代日本专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和现状等问题所作研究的一部分。日本蒙古学的这一新趋向正处于一个活跃时期，尤其是一九七二年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

蒙古和苏联专家在第一组中所作的关于经济方面的十六篇报告，阐述了诸如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近期展望（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博士其·札嘎斯巴拉登）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完善化（苏联经济学家副博士T·C·玛特维耶娃），蒙古人民共和国农业的结构改革（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博士丘·达西吉多布），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成就的特点（苏联经济学家副博士A·A·塔尔鲍娃）、现状及其未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博士丘·吉尔札布），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对蒙古经济的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博士T·那木吉木，苏联经济学家副博士T·A·雅基莫娃），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改善（苏联经济学家副博士C·K·罗申）等重大问题。一些基本问题，如蒙古人民共和国变为工业——农业国以及工业成份在国民总产值生产中的增长，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生产部门的农业的提高和巩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先进国家发展水平的接近，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形式（国有制与合作制）、接近过程的加速等问题，也在一些报告人的有关发言中得到了论述。此外，一些个别经济问题只是在波兰学者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黄维南教授的发言中有所涉及。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这表明，在以最为理想的方案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完成阶段，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问题和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社会经济最迫切的问题方面，蒙古本国和苏联的蒙古学研究工作占有领先地位。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殊格德尔论·阿仁巴勒丹著作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付博士丘·达希札木茨论人民政权时代宗教界发生的根本变革，哲学付博士P·南斯勒论人民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和壮大，法学博士丘·桑吉丹赞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等报告，说明蒙古本国的蒙古学研究工作中的新兴部门——对蒙古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精神生活以及新法律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正在得到不断加强。

总的说来，“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组的活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蒙古学依然处于对蒙古人民的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研究工作的领先地位。

因而，该组听取的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当代的迫切问题。这些报告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历史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一九二一年蒙古革命史的研究上，都集中在对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以及革命前蒙古历史和文化的核心问题进行科学阐述和通俗化上。此外，该组活动还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对蒙古现代史及其现状的兴趣正在不断增长。

第二组——“蒙古语文学和艺术学”组共听取了五十一篇报告。

第一次组会上由该组召集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通訊院士A·劳布桑登德布宣读了题为《蒙古民族文学语言的形式》的报告。报告提出了蒙古文学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科学分期问题，并对每个发展时期作了详细论述。报告中，分析语言对蒙古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和统一的影响那一部分，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兴趣。

有三十一篇报告谈到了蒙古语言学问题。III·罗布桑旺丹院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于蒙古中部地区语言中的长元音问题》，语文学博士Ч·罗布桑札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论助动词》，语文学博士Г·Д·桑杰耶夫（苏联）的《正字法和语音实际的蒙古学问题》，语文学副博士А·А·达尔别耶娃（苏联）的《蒙古文学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中适应性借词的功能关系》，М·М·索甫洛诺夫教授（苏联）《关于方体字的研究》，Х·П·费采博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蒙古民族语言发展的若干问题》，М·П·维夫和Р·奥迈昂（法国）的《蒙古语言中的色彩》，ДЖ·克留格尔教授（美国）的《中拉特语辞典编纂法简论》等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II·卡鲁任斯基教授（波兰）和III·大泽（日本）的报告，对《蒙古秘史》中的一系列重要术语作了新的解释。德耶尔特·卡拉教授（匈牙利）在《论契丹人的两种书写体系》的报告中，对契丹人和蒙古人的语言同源问题提出了有力的新论据。田中克彦教授（日本）在发言中提出了有关“新词分化”这类尖锐问题，这是指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蒙语方言中不合理的现代化或汉化问题。他对中国当局从一九六〇年以前推行的语言政策提出了批评。Г·占布拉苏荣（蒙古人民共和国）阐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蒙语中采用科学技术名词术语所持的科学态度。

语言学报告所占的优势，报告的选题和内容，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证明，在蒙古语言学若干主要方面——诸如描述语音学、历史语音学和比较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语义学和辞典编纂学——的发展中以及在研究语言的相互联系和比较关系方面，最近几年来都获得了显著成绩。

该组听取的十四篇语文学问题的报告，对现代蒙古文学的基本形式——小说（蒙古人民共和国С·罗布桑旺丹）、诗歌（蒙古人民共和国语文学副博士Д·曾德）和歌曲（苏联语文学副博士К·Н·雅茨科夫斯卡娅）——的特点作了论述；对蒙古史诗大型作品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苏联（语文学副博士С·Ю·聂克留多夫、Е·О·帕努耶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K·萨加斯特博士）对《洛斯尔传》的研究以及苏联对《江格尔传》的研究（语文学博士И·К·伊利什金）——作了报告；对很少有人知道的十四世纪蒙古文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海西格教授）和十七世纪一位佚名蒙古语文学家的情况（匈牙利A·沙尔克兹）作了报告；对蒙古文学和蒙古中世纪、近代和现代民间文学提出了许多其他问题，在成功地研究蒙古人民最为丰富的口头创作方面反映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系列报告，其中包括蒙